

医学与生命哲学研究



前 言

对于湖北省的医学和生命哲学研究,这本《医学与生命哲学研究》的出版应该是一个有意义的日子。医学哲学是一个新兴的学科,欧美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逐渐成熟起来的。我国的医学哲学研究是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起步时间在国际上并不算晚。湖北省的医学哲学研究在国内曾经有过一阵比较辉煌的日子。由于各种原因,医学哲学研究最近几年比较沉寂。这本《医学与生命哲学研究》,是在 2012 年 8 月由湖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湖北省伦理学学会协办,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和《医学与社会》杂志社承办的“医学与生命哲学学术研讨会”所收到的会议论文的汇编。在筹备这次研讨会期间,我们估计参会论文不会太多,可最后我们收到正式参会论文 35 篇。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医学与生命哲学:历史与现状”。医学哲学的发展历史虽然不长,学科也不太成熟,但它像其他学科一样受到时代的冲击。当今医学的最大特点,就是生命科学、克隆技术、基因工程这些攸关人类命运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被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所取代。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心理的、伦理的、道德的、社会的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对人的生存本质、人生活的意义与人生何谓幸福的认识。人虽然是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各种属性的统一,但决定人的生存本质的是人的社会属性。人归根到底是一种由各种社会关系所决定的高等动物。人的生命的各种生理机能和心理活动在不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下是不同的,无论是族群还是个人,其中都有明显的差异,并由此决定和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和生存状态。这就要求医学哲学加强对人的本质和各种社会属性的研究。以人为本,这才是医学科学发展的灵魂,也是医学的科学发展观。

当代医学哲学和生命哲学面临着一系列既非常重要,同时又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这些问题中有很多是传统哲学,特别是传统的生命哲学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传统的生命观就受到当今医学和生物学的极大冲击和挑战。在今天,新的医

学技术和分子生物学已大大突破了传统的生命观,胚胎是不是生命、受精卵是不是生命、人的生命可否被复制、生命可否人工制造、人可否当做工具或实验品?在人类沿着 21 世纪不断迈进的过程中,生命的神圣性和生命的不可侵犯性不断受到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医学技术的挑战。这些问题需哲学做出新的回答,如果哲学在这些问题面前作不出合理的回答,哲学在当今这一时代将难以取信于人。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是某一个哲学家或某一位哲学工作者的任务,甚至也不是某一个学科(哲学的二级学科)所能够回答的。我们出版的这本《医学与生命哲学研究》汇集了湖北地区不同学科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希望这本论文集的出版不仅对湖北省的医学与生命哲学研究有所裨益,而且对整个中国的医学与生命哲学研究作出我们自己的一份贡献!

秦园东路水岸新城战锅策创意火锅店姚涓女士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资助。姚涓女士是湖北大学校友,多年来一直关心和支持湖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建设和发展,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刘建凡 舒红跃

2012 年 12 月 5 日于湖北大学

目 录

医学哲学:历史、现状与主要问题	刘建凡(1)
关于技术的价值反思	
——从“克隆人”说起	孙伟平(9)
关于“人工合成生命”的哲学思考	李锐锋 冯云珠(18)
基因干预的伦理论争	
——基督宗教和俗世文化比较研究	程新宇(25)
哲学与医学关系论纲	戴茂堂(33)
生命的拯救与人的根本义务:康德生命哲学的一个初步研究	方 永(46)
从形而上学“位格”视角反思“人类基因组计划”	徐 瑾(54)
中医药视野下的辩证法	万强强(60)
生命张力与自我救赎	
——福柯的生命伦理思想	高乐田 代 恒(66)
活取熊胆的伦理拷问	周海春(72)
论医疗保健的公正	胡真圣(80)
基于广义科学哲学的中医本性新解读	赵 伟 万小龙(86)
《周易》之“咸”与当代男女生活幸福	江 峰(93)
恩格尔哈特俗世生命伦理思想的启示	冯 军 陈雯霆(103)
康德的“人是目的”公式及其在生命伦理学中的意义	姚 云(111)
小议我国公立医院治理的变迁路径与创新	李文敏(121)
对社会公共健康的伦理辨析	王义芳(127)
从科学划界标准来看中医是不是科学	李 莉(133)

论柏格森生命哲学中的技术观	舒红跃	肖 扬	(138)
天主教的生死观与安乐死	余卫东	石 云	(146)
恩格尔哈特俗世的生命伦理学概述	张 清		(153)
新医学技术背景下的公共医疗资源分配	陈 俊		(157)
堕胎的伦理学论争与反思	倪 霞		(168)
“人生就是世界”			
——论前期维特根斯坦生命哲学	徐 骏		(180)
伦理学视阈下民生问题探析	姚才刚	汪建人	(192)
“毒胶囊”事件的伦理反思	杨海军		(199)
从医德视角反思“毒胶囊事件”	陈国鹏		(204)
试论亚里士多德哲学对盖伦医学的影响	涂江波	汤波兰	(209)
当代医药道德的伦理思考	徐志瑾		(219)
生存视域下的《史记》生死观研究	杨爱琼		(224)
柏格森宗教观中的生命哲学之光	张慧琴		(231)
尊重生命,远离毒胶囊	杨 莹		(238)
浅议戒烟药入医保	张 杰		(242)
论死亡的哲学意义	罗 超		(247)
丹溪医学之理学渊源述论	汤文博		(253)

医学哲学：历史、现状与主要问题

刘建凡^{*}

摘要 医学哲学的历史是医学与哲学互相联系,特别是医学借鉴当时有着重大影响的哲学理论的历史。同任何其他学科一样,医学哲学的产生、酝酿和成熟都需要一个长久的成长历程。当代医学哲学面临着一系列既非常重要,同时又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这些问题中有很多是传统生命哲学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哲学在这些问题面前做不出合理的回答,哲学在当今这一时代将难以取信于人。

关键词 医学哲学 历史 现状 问题

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已存在两千多年;科学哲学或技术哲学也产生了将近 150 年的时间;而作为一个部门哲学的医学哲学,也就是哲学这个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之下的分支学科,它的正式建制还不到半个世纪历史。下面我们对这个新兴学科的历史、现状和它所研究的主要问题做一阐释。

一、医学哲学前史

作为一个学科,医学哲学既古老而又年轻:说它古老,因为医学哲学思想早已在中国、希腊等古代文明中有所记载;说它年轻,因为医学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只有几十年的光景。医学哲学的历史是医学与哲学互相联系,特别是医学借鉴当时有着重大影响的哲学理论的历史。

传统中医学无论运用的语言材料,还是在不同时期的表述形态,都与我国古代哲学思想有密切联系。例如,传统的精气学说就从《周易》的卦交理论和黄老之学中吸收养分;《黄帝内经》中的天人相应思想、宋明理学的太极本体论都对传统医学发挥着重要影响。传统医学的阴阳五行说正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思想与医学相结合的结果。

^{*} 作者简介:刘建凡(1957—),湖北大学党委书记,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医学哲学。

西方也是如此,古希腊的哲学思想对西方古代医学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泰勒斯是西方哲学开创者,他首先在哲学上探讨了世界本原问题,认为“水”是万物本原,万物皆从水中产生,最后又复归于水。科斯医学学派的创始人、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受泰勒斯哲学思想的影响,认为“体液”是生物有机体的本原,人体就是由体液构成的。古希腊另一位哲学家恩培多克勒提出了“四元素说”,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四种元素组成的,即气、火、土、水,它们具有不同的冷、热、干、湿性质,这四种元素的不同数量比例混合起来,就形成了各种性质的物体。希波克拉底接受了恩培多克勒四元素说的哲学思想,提出了“四体液说”,认为人体内存在四种体液:血液、黏液、黄胆汁、黑胆汁,这四种体液的冷、热、干、湿程度各不相同,并会随季度变化,其比例适当即可保持健康,如果失当便会导致疾病。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说成为其后两千多年西方一切病理学的基础。

古希腊哲学家留基伯、德漠克利特的原子论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极小的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各种原子在质上没有区别,只有大小、形状和位置的不同。这些原子在不断地运动着,时而结合,时而分离,从而形成复杂多变的自然现象。克尼德学派深受原子论的影响,认为人体物质基质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具有可移动性,能够不断地在微孔中循环。机体正常的或病理的状态,首先取决于原子在微孔中循环的性质,其次取决于微孔的宽窄,微孔的宽窄变化是病理状态的重要原因。

古希腊哲学的高峰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不同于他的老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实在的物体之外不可能有独立存在的理念世界,存在通过知觉而有知识。亚里士多德主张对自然现象进行普遍的严格的观察和历史的研究,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了解自然,判断的源泉是观察、经验和归纳演绎,并认为哲学应从医学开始,而医学最终应归结于哲学。亚里士多德创立的以三段论为中心的形式逻辑学培植了包括西方医学在内的整个西方科学。古罗马时期的医学家盖仑深受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最好的医生应该是一个哲学家,呼吁医生必须首先认真地学习哲学,以便了解人体健康和疾病的本质。盖仑力图将古希腊时期的科斯学派和克尼德学派协调起来,使液体和固体的要素都服从于他的“灵气论”。盖仑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应用于疾病的分类,甚至用类似欧几里德几何学的逻辑来建构自己的医学体系,使医学从经验水平上升为一种严谨的逻辑体系。从此,一种类似于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公理演绎法成为亘贯于欧洲中世纪医学的基本逻辑思想。西方医学公认西方第一位医生是希波克拉底,列为第二位的便是盖仑。

医学的近代化得益于西方近代形而上学的影响。18世纪的形而上学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个性,反对神圣;提倡实验,反对空谈。这些哲学思想为自然科学和医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543年,维萨里发表《人体的构造》,用解剖刀这一



锋利的武器纠正了盖仑医学体系中的错误,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地揭示了人体的真实结构,掀开了人体解剖学的新篇章。1628年,哈维发表了《心血运动论》,用实验方法进一步抹去了宗教神学蒙遮在人体上的神秘面纱,使生理学确立为科学,为近代基础医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科学基础。

英国哲学家培根在总结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发表了《新工具论》,制定了归纳法。培根把医学按其功能分为三部分:保持健康、治疗疾病、延长寿命。培根一方面强调,我们喜欢的医生具有渊博的学问,重视实践,或者他们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培根又认为,医生的活动,尤其是治疗方法的有效性,取决于正确理解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医学不依靠哲学就靠不住。培根把归纳法应用于医学,强调病史对认识疾病的发生具有特殊的作用。他主张医生必须对病理解剖学进行细致的实验研究,必须广泛研究比较解剖学。培根的哲学观点成为近代实验医学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

18世纪的医学越来越带上机械论和还原论色彩。由于伽利略在机械学和力学上所取得的成功,人们以为一切自然现象包括生命活动都可以运用机械力学原理而迎刃而解。伽利略的朋友桑克托留斯首先应用伽利略的仪器,根据度量原则,企图测定人体的体温、脉搏以及体重等动态变化。哈维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以计量方法和动力学原理来描述血液循环。笛卡尔在哲学上确立了机械论,并以机械学原理来解释生理现象。他以哈维的血液循环作为其机械论的证据之一,认为“宇宙是一个庞大的机械,人的身体也是一部精细的机械,从宏观到微观,所有物体无一不是可用机械原理来阐明。”^①受笛卡尔哲学思想的影响,伽利略的学生波累列在对动物运动的研究中,试图以严格的机械论加以解释,并用数学公式表达出来。他曾用杠杆原理来说明手臂的运动,认为人体的生理活动都可以用机械律说明。

二、医学哲学:建制史和现状

西方现代医学哲学的成熟不是一蹴而就的。同任何其他学科一样,医学哲学的产生、酝酿和成熟都需要一个长久的成长历程。虽然医学哲学的专业术语在19世纪初期就已经恰当地被制定了,但是,作为一门在学术上被公认的学科,医学哲学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因为直到20世纪70年代,医学哲学才逐渐成长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也是在这个时候医学哲学才开始它的正式的建制过程。1974年至1977年,美国乔治城大学和康尼狄克大学医学中心先后组织5次跨学科的医学与哲学讨论会。1975年,英国的《医学假说》和《医学伦理

^① 转引自刘学礼:“医学哲学的历史发展”,《南京医科大学学报》2002年第12期,第265页。

学杂志》创刊。197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发行了《医学与哲学杂志》。该杂志宣称:“医学的概念基础从来没有比今天对人类有更广泛的影响,而对它们进行批判的、辩证的和思辨的(即哲学的)考察也从来没有比今天更迫切。”其后不久,美国哲学学会设立了哲学与医学委员会。1980年,由德国、美国、以色列、波兰、西班牙等国学者编辑出版了《元医学—哲学医学和医学方法论国际杂志》(1984年起更名为《理论医学》),声称其宗旨是“为医学研究和医学实践的哲学和方法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一个论坛。”1981年,在世界卫生组织主办的第一届国际医学哲学大会上,讨论了医学哲学的可能性和意义、医学研究的哲学、医学思想史、医学与社会等问题。198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设立的世界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召开了“卫生政策、伦理学和人的价值”国际会议后制定了专门的规划。随着生命科学的迅猛发展,医学哲学成了医学界、哲学界共同关心的热门话题,许多国家成立了全国性或区域性的研究组织。

现代医学,特别是当今生命伦理学所探讨的许多问题,它们不是医生从纯粹医学的角度能够解释或比较完好地解释的,这些问题都是一些涉及到生命的本质、人生的价值等形而上学的问题,因而是一些需要借助于哲学理论才能够解释的问题,这些问题所涉及到的概念不再属于纯粹医学范畴,而是属于医学哲学的范畴,尤其是那些对健康和疾病本质的讨论。当今时代是一个日益俗世化和不断强调个人的年代,西方开始怀疑社会结构(如家庭)的价值。生命伦理学和卫生保健政策中的不履行责任的立场也欲把以个人为中心的观念作为权力和价值的取向,关于相关价值的客观性及具体价值取向的正确性也引发了关于疾病和健康性质的讨论。因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医学哲学得到社会的关注和广泛的学术认同,因为医学哲学至少为社会转型所引发的冲突提供了一个理性的、令人深思的蓝图。

“人们可以确切地具体验证某些重要难题,比如疾病和健康的性质、医学解释的特点,以及医疗资源分配要保证适当的正义和公平的理解等一系列生命伦理学的问题。但聚焦这些具体的议题可能会陷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①这不是说对于源自诸如自由的性质、知情同意、艾滋病危机、涉及人体研究的状况、关于新的遗传技术的反思等具体话题和议题已不能激发人们强烈而持久的兴趣,而是说较之这些具体的问题,讨论和研究的内容更优先要考虑的是,人们需要在理性上对生物医学和生物医学技术进行定位。因为这些研究不仅会不断地消耗所有国家的经济实力,而且由于它们的侵扰将鼓励研究向更为激进和极端的方向延伸。因此,需要正确评价医学和生物医学技术所从事的研究能随之带来哪些未经

^① T. 恩格尔哈特:“当代医学哲学的课题与历史责任——恩格尔哈特教授答杜治政教授问”,《医学与哲学》2005年第三期,第23页。



检验的价值观、担忧和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应该获取一种新的观念,这种新观念能帮助人们找到承诺的定位,找到所花费的医学代价在人的观念可接受以及人类社会制度可允许的范围。

在美国,自1970年代以来,医疗卫生愈加由有意识的哲学思考所构画。部分是源于“保护生物医学及行为学研究受试者全国委员会”的思考。这个委员会将全国的注意力聚焦于对生物医学和行为学研究的受试者需适当地进行道德预测。人们公认,对于恰当地指导医学和生物医学科学,哲学思考是重要的。此事件不仅导致了创建社会机构审查委员会去评估涉及人体研究的性质,甚至发展为建立医院伦理委员会,并且促进了医学与哲学的结合,特别是生命伦理学走进了医学院学生的教学课程和从事特殊专科的医务工作者的培训课程。结果是,医学哲学,特别是生命伦理学,成了医学研究、医院生活和临床医生教育的行为准则。当今的临床医生越来越认识到医学哲学对他们日常的临床实践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生命伦理学。“引人注意的是,在过去的30年中,医学哲学的正确评价,尤其生命伦理学,已经完善了医学教育和医疗实践医学哲学,特别是生命伦理学,已经直接塑造了我们文化生活的特征……医学哲学,特别是生命伦理学,作为核心的人文科学之一,已经直接塑造了我们文化生活的特征。”^①

比如当今医学哲学最为成熟的美国,从事生命伦理学和医学哲学的人员的学术组织是美国生命伦理学与人文科学协会。该协会汇集了一批哲学家、人文学家和临床医生,他们致力于探索医学和生物医学科学的概念性、解释性及价值性预测。此领域中的研究日益增多,包括经验主义、真实态度的社会科学调查、责任以及病人、医生和生物医学科学家的行为等问题。得到广泛接受的重要意义在于,人们明确了道德责任应该指导临床医学和生物医学研究,生命伦理学教育已成为美国所有医学教育的一部分。这种教育分别在临床上岗前及临床工作几年以后进行。它也被广泛地融入到对住院医生的培训规划中。美国的医学教育已经接受了这种观点,即生命伦理学的正确评价是对临床实践的完善。无论是来自于哲学家,还是来自于临床医生的教师都要接受医学哲学和生命伦理学教育。“只有对医学哲学范畴内的更宽泛的术语进行理解后,才能充分地理解生命伦理学。”^②

在我国,成熟的医学哲学是在对西方医学哲学的借鉴和介绍的过程中在产生的。早在1924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由医学家汤尔和翻译、日本学者永井潜著的《医学与哲学》一书。1929年,中西医汇通派著名医家张锡纯发表了《论哲学与

① T. 恩格尔哈特:“当代医学哲学的课题与历史责任——恩格尔哈特教授答杜治政教授问”,《医学与哲学》2005年第三期,第24页。

② T. 恩格尔哈特:“当代医学哲学的课题与历史责任——恩格尔哈特教授答杜治政教授问”,《医学与哲学》2005年第三期,第24页。

医学》一文。1934年,余鸿仁发表《医学与哲学之关系》一文。新中国成立后,研究哲学对医学的指导作用,一时成为热门课题。不过,建国以来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时期我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也受到了“左”的思想的干扰,走了一段弯路,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思想问题的界限,把在医学中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简单化和庸俗化,因而在不同范围和不同程度上挫伤了医学家的积极性,束缚了医学的发展,我国医学哲学的研究也因此受到挫折。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的医学哲学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1979年年底在广州举行的全国医学辩证法讲习会是我国医学哲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我国医学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的论点。这种面向社会、面向医疗卫生的改革实践,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成为以后我国医学哲学发展的一大特点。邱仁宗等编译的《医学的思维与方法》和《对医学的本质和价值的探索》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影响。《医学与哲学》于1980年6月正式发刊,它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医学哲学的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编辑出版的《医学与社会》也有“医学与哲学”的专门栏目。

三、医学哲学的未来发展与研究的主要内容

当代医学哲学面临着一系列既非常重要,同时又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这些问题中有很多是传统哲学,特别是传统的生命哲学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传统的生命观就受到当今医学和生物学的极大冲击和挑战。在今天,新的医学技术和分子生物学已大大突破了传统的生命观,胚胎是不是生命、受精卵是不是生命、人的生命可否被复制、生命可否人工制造、人可否当做工具或实验品?在人类沿着21世纪不断迈进的过程中,生命的神圣性和生命的不可侵犯性不断受到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医学技术的挑战。这些问题需哲学做出新的回答,如果哲学在这些问题面前作不出合理的回答,哲学在当今这一时代将难以取信于人。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不是某一个哲学家或某一位哲学工作者的任务,甚至也不是某一个学科(哲学的二级学科)所能够回答的。科学技术哲学或自然辩证法作为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二级学科,在哲学这一大的学科面对难以回答又不得不回答的重大问题面前必须作出自己的回答。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医学哲学专业委员会”编写、发表于“医学与哲学”上的“医学哲学研究纲要”对我们如何回答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个有益的尝试。在“医学哲学研究纲要”中,我国自然辩证法哲学界,特别是自然辩证法研究中的医学哲学界对我国医学哲学未来的研究方向做了详细的描述。它所提出的研究纲要由医学哲学的历史与概念、医学本体论、医学观、医学认识论、医学方法论、医学价值论、医学伦理学的哲学问题、卫生保健政



策的哲学问题八个方面的内容组成。^①

第一,医学哲学的历史、概念与意义。这一方向研究医学哲学的历史,主要包括古埃及、希腊、罗马时期的医学与哲学,中医与哲学,当代生命科学哲学兴起的背景,医学哲学概念的内涵、研究对象、逻辑起点、基本结构,以及医学哲学对医学、医学人才成长的意义等内容。

第二,医学本体论。这一部分内容包括医学哲学的生命观(生命的定义、起源、本质、过程与属性等)和人体观(人体的结构与功能、人体的进化等)两个问题。

第三,医学观。医学观包括七个方面的内容:(1)医学的概念、性质、目的,医学的社会人文属性,医学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2)医学发展的历史规律、动力、影响因素及当前态势;(3)医学发展模式、医学内容体系;(4)健康观、疾病观、诊断和治疗观(如过度治疗、放弃治疗、无效治疗、替代治疗等问题);(5)预防与公共卫生;(6)医学技术论;(7)传统医学的发展与未来。这一部分既包括中医未来的历史定位这样对我们中医具有意义的问题,也包括信仰可否治病、如何评价美国等国的信仰医学的问题。

第四,医学认识论。医学认识论包括医学认识主体和医学认识客体,临床思维的范畴、规律、特点及有关问题,医学实验研究的思维方法,医学语言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五,医学方法论。医学方法论包括现代科学技术一般方法在医学中的应用,医学问题和医学假说,医学发现、发明与创新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六,医学价值论。医学价值论包括医学价值的内涵,医学价值的继承与发展,医学的正价值、零价值和负价值及其控制,全球化与医学价值,医学价值的冲突和选择等具体问题。

第七,医学伦理学。医学伦理学是医学哲学的重中之重,这一部分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生命伦理哲学。这一部分又分为五个方面的内容:(1)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哲学问题;(2)人类基因组计划与人权等相关问题;(3)克隆等无性生殖的伦理社会问题;(4)知情权问题;(5)生命维持技术的伦理。

二是死亡哲学问题。这一部分也分为下面五个方面的内容(1)死亡哲学;(2)死亡伦理学研究;(3)安乐死的伦理哲学研究;(4)临终关怀(宁养)的伦理意义;(5)自杀的伦理学研究。

三是生物医学人体试验。这一部分包括六个方面的问题:(1)医学科学的发展与人体试验;(2)人体试验的人权问题;(3)人体试验的历史与教训;(4)实验伦

^①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医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医学哲学研究纲要”,《医学与哲学》2004年第12期,第3~9页。

理原则;(5)受试者的权益维护;(6)人体试验的知情同意。

第八,卫生保健政策的哲学问题。这一部分包括五个方面的问题:(1)卫生保健服务的本质特点;(2)卫生保健政策与改革中的自由主义与平均主义、配给制与自由选择;(3)卫生保健政策的公平与效率、公平与公正;(4)卫生资源的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5)卫生保健服务的国家调控、卫生保健服务的私有化。

虽然“医学哲学研究纲要”对我国目前医学哲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做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被包含在这一纲要之内。比如,如何完善医学哲学这一分支学科的建制化问题(不管是在我国还是其他国家,医学哲学的建制化,如机构的完善、人员的配置等等远未完成);医学哲学经典著作的推出问题(科学哲学的经典著作可以说多如牛毛,技术哲学也有一些公认的经典著作,但医学哲学的经典著作少之又少),这些问题极大地制约着医学哲学的健康发展。

另外,还有一个对我国医学哲学发展非常不利的问题,那就是由于我们在人才培养模式、学科交流方式上的缺陷所造成的不同学科之间的隔阂。一方面,我国哲学界和医学界在加大两个学科之间的联系上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另一方面哲学和医学界之间的隔阂仍然存在。当今我们从事医学哲学研究的人员主要有两部分,一是从事医院和医学具体工作、同时又对哲学感兴趣的这部分人,一是原来从事哲学研究,后来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医学问题(主要是生命伦理问题)的这部分学者。前面一部分人优势是对医学有着非常感性的认识,但这部分研究者不论是对中国传统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缺乏深入的研究;至于后者,虽然其中很多学者对中国传统哲学或西方哲学有着较深入的理解,但他们对医学的具体工作又缺乏比较感性的认识。这就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加强两部分学者之间的联系,只有培养出既具有深厚的哲学功底,同时又对具体医学工作有着非常感性认识的学者,我国的医学哲学研究才能够取得真正深入的、具有可持续性的发展。

关于技术的价值反思

——从“克隆人”说起

孙伟平^{*}

摘要 技术已经改变了或正在改变着世界,改变着人自身。由于“克隆技术”等高新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如何预测和确认高新技术的可能后果?如何看待技术的本性、技术与人的关系和技术自身的价值?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已经严峻地摆在人们面前,需要人们坚持自己的主体地位,进行全面的考量和批判,加以审慎的抉择。应该看到,技术不过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它可能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自身,取决于人们的观念,取决于社会制度,取决于人们具体的选择和行动。一切人,特别是科技工作者肩负着神圣的、不容推卸的道义责任。

关键词 技术 克隆技术 技术中性论 技术的价值 价值反思

按照先哲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技术是与理性、正确知识相关联的创造性的行为。技术已经改变了或正在改变着世界,改变着人自身。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已经充分技术化的时代,随时随地都在与各种各样的技术形态打交道。或许,我们这个时代可以名之为“技术文明”时代。但是,这个时代是好是坏,是善是恶,是福是祸?或者说,技术与人类自身、与社会和人类文化的关系如何?却是一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话题,需要我们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立足哲学价值论的视角和理论,进行认真的审视和深刻的反省。

一、“克隆”技术引发的反思

1997年2月,一只驯服可爱的小绵羊“多莉”在苏格兰罗斯林研究所诞生了。这是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羊,从此,“克隆”技术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克隆”一词也因之迅速传遍了世界。“多莉”降生后,克隆技术更是突飞猛进,相关研究者跃跃欲试,大胆推进,不断有“克隆人”试验的消息传来。

如果说克隆羊带给世人的主要是惊异和好奇,那么,“克隆人”则影响更为强

^{*} 作者简介:孙伟平,哲学博士,湖北大学哲学院“楚天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价值论、伦理学。

大而深远,它带给世界一股强劲、锐利的冲击波!它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意义深远的讨论!

表面上看,人们可以列举出许许多多赞成“克隆人”的理由,例如,克隆人研究有助于探索人自身的身体结构之谜;利用克隆技术,可以用患者本人的细胞培育出新组织,用来治疗神经损伤、糖尿病、帕金森氏症等多种疾病;如果克隆出至爱的亲人,则有助于缓解人们失去亲人的痛苦……

但是,质疑和反对克隆人的理由也许更多。例如,从生物多样性来说,克隆即复制大量无个性的相同个体,可能导致世界失去本来的丰富多彩本性;克隆人可能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而产生心理缺陷,形成新的社会问题;克隆人技术可能会被滥用,成为器官贩卖分子、恐怖分子的工具;克隆人与被克隆者之间的关系,尚无法简单地纳入现有的伦理体系,从而搅乱诸如父母与子女的亲情;人类繁殖后代的过程不再需要两性共同参与,这将对现有的社会关系、家庭结构造成难以承受的巨大冲击……

特别是,凭借克隆技术,有人声称,任何人都从此可以永存世间,“万寿无疆”。可是,实际上,人们正是通过“死”才知道、领悟“生”的,如果没有了“死”,那么何来“生”呢?而且,正是因为有死,有限的生命才具有如此绚丽多彩的价值与意义,人们才会如此顽强地珍惜、珍重生命,如此执著地追求短暂生命中的快乐和幸福;也正是因为有死,才有了英雄主义,才有了普遍爱心,也才会以强烈的激情去开掘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如果没有了死,那些克隆出来的肉体组织不过是一堆堆行尸走肉。……毕竟,“长生不死”是违背铁的自然法则的,是违背既有的文化价值体系的。

甚至,从目前的生物、医学理论看,克隆复制也并非万无一失:例如,克隆物没有变异,而变异是物种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大量基因结构完全相同的克隆人,可能诱发未知的新病菌的产生,或无法抵御未知的新型疾病的流行,从而可能导致人类最后的灭绝……

面对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带给人们的疑虑、不安、甚至恐怖,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保持一种理性的思考。一方面,我们自然没有必要惊惶失措,没有必要夸大其辞。任何匆忙的结论,任何武断的决定,特别是任何草率的行动,也许都会令我们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应该看到,人们对于克隆技术可能存在许多想当然的误解。尽管不存在技术上的最终困难,但克隆技术仍然是尚未成熟的“新技术”,克隆人更是存在许多具体的困难。一般情况下,克隆羊时 1000 多枚卵子只有一枚能存活,从人的条件来说,一位女性一次最多只能排卵 5~6 枚,且不说人比一般动物复杂得多,即使仅仅是如同克隆羊一样克隆人,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里仍有漫长的路要走,我们还有大量的时间进行思考和决策。或许,科学最终会证明,即使克隆出来了人,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也可以在人类的控制之



中。就拿试管婴儿来说,当年也曾经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反对者也曾经十分激动,但是,现在试管婴儿已经十分普遍了,也渐进地为人们接受了。可见,我们不必要过分地为猜想、假设和推论伤神。另一方面,确实也应该注意到,有一些担心是似是而非的,如一提到克隆人,人们马上联想到克隆出丧心病狂的战争狂人希特勒,或者克隆出杰出科学家爱因斯坦。实际上,这仅仅是人们的一种想象。一个人的智力、能力、思想、感情、心理等,是由先天遗传性和后天的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人的克隆即使成功,实际上克隆的仅仅只是“人体”而已!或许,将“克隆人”称作“克隆人体”更恰当些。况且,克隆的“伟人”或者“恶人”即使把其细胞中所有的基因都保存下来,由于这些基因是处于另一个生命的卵的细胞质中进行克隆,所以基因的表达会受到细胞质的调控,远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这里,简单的设想和推论并不具有实际的意义。

克隆技术并非只是福祸未知的高新科技发展中的特例。类似的前景不明朗、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的高新科技成果还有许多,如生殖技术、优生与人工流产、安乐死、器官移植、基因技术、核技术、信息技术……人类的创新能力日益强大,这串名单仍然在不断“生长”。

无论如何,由于高新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已经严峻地摆在人们面前。例如,如何预测和确认某种高新技术的可能后果?如何规范科技工作者的所作所为?谁有权力对新技术的实施进行评价与抉择?高新科技的创新和应用应该制定什么样的程序和方法?科技工作者应该具有怎样的社会责任感?政府、社会、人文学者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干预技术的创新与应用?等等,都需要进行深入的、审慎的思考。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慌慌张张、匆匆忙忙地决策,往往可能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从当今高新科技的威力看,则有可能导致人类难以承受的悲惨后果。人类绝不能等闲视之,绝不能无动于衷。

二、全面考量技术的正负效应

关于技术的本性、技术与人的关系、技术的价值等问题的思考,如技术本身是负载价值的吗?技术是否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技术是否增进了人的幸福和社会的正义?技术是否有助于人与社会的健康发展?等等,是一些既古老而又困难的话题。由于当今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如核能技术、生化技术、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等的崛起,特别是技术在市场经济和工业化过程中所导致的种种负面效应,技术与人的关系、技术的价值等问题已经越来越引人关注。

历史上曾经有一种古老且十分流行的观念:技术是人类的工具,是价值中立或道德中立的,是用来达到人类的特定目的、满足人类的特定需要的手段;技术本身并没有所谓好坏、善恶之分,只有那些创造和使用技术的人,才使得技术成为一种行善或作恶的力量。这种观念特别受到工业革命以来一些在技术创新或技术

垄断方面占据优势地位的工程师、企业家的欢迎。因为,这种观念不仅可以为他们的技术创新、操作、应用提供有效的辩护,而且可以回避或削弱政府、NGO 组织、公众等的质疑、批判、干预和控制。

科学大师爱因斯坦曾典型地表达了这种观念。他指出,科学技术“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①。

技术中性论的代表人物梅塞勒也指出:“技术为人类的选择与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对这些可能性的处置处于一种不确立的状态。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②

然而,随着技术的大规模开发和无孔不入的应用,它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实践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层次;技术一旦为人所发明之后,就会成为发明、应用者的一种内在或外在的力量,从而可能在生产、生活中产生许多不同的价值后果。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技术及其应用可能内蕴着的或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进行具体的分析,特别是警惕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对利益、利润的疯狂追逐而可能产生的负效应:

例如,科学技术改变和重塑了社会结构的形式,原先独立的家庭式企业以及独立的个人企业,均被纳入到大规模、非个体的联合体之中,个体直接成为从属于联合体或社会的“原子”,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治成了社会性的,它代表着整体,实施“无偏见的管理”。任何人,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被一套“合理化”的机构、程序所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正如马尔库塞所指出的,人类“不过是一种材料、物品和原料而已,全然没有其自身运动的原则”。

再如,科学技术的发展、应用所带来的机械文明,使工具异化为奴役人和束缚人性的工具。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规模化、自动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智能机器人、生产流水线操作越来越普遍。此时,人的作用越来越单一化,越来越沦为“机器的奴隶”或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在生产流水线上,有时一位工人的全部工作仅仅只是在同一工作环境中,单调地装一个部件,或者是拧一个螺丝,或是将产品装箱而已……经年累月地从事同一种简单、机械的工作,许多人完全失去了工作的新鲜感、乐趣和热情。而且,“老板们”为了所谓的劳动效率,为了追求高额利润,总是希望使用“熟练工人”,不愿也不会轻易给人调换工作岗位,哪怕这一工作岗位再简单不过。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开始从事这一工作的

① 《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许良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6页。

② Emmanul G. Mesthene, *Technological Change: Its Impact on Man and Society*,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0, p. 60.